



同济·欧洲文化丛书

● 法兰西文化系列 ●

[法]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著 赵 靓 译

中国妇女

Des Chinoises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74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该年5月，作为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论坛《原样》(Tel Quel)的一员，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菲利普·索列尔(Philippe Sollers)以及《原样》杂志主编马尔塞林·普雷奈(Marcelin Pleynet)等人对中国作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参观访问。这次访问，产生了大批的相关著述。克里斯蒂娃应法国妇女出版社之约，当年就发表了这本纪实游记。

在本书中，克里斯蒂娃对两千年来笼罩在中西方文明之间的神秘面纱作了某种原创性地揭晓。她凭借在哲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和符号学等人文学科理论上的广博知识，抓住母性和性别差异的主题，以中国家庭为横坐标，以中国历史为纵坐标，从政治、宗教和文学等各个方面作出以点带面的全景式分析。全书理论性强，由于众多学科理论的综合运用，使得本书较为艰涩难懂，本书的论述立场也曾受到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等女性主义作家的质疑，在有关殖民主义理论、身份和统一性等等问题的讨论史上具有典型意义。同时由于客观翔实的记录部分，对于促进中国妇女运动和女性文化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书由法国外交部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傅雷”图书资助出版计划资助出版

ISBN 978-7-5608-4165-6



9 787560 841656 >

定价：21.00 元

目 录

再版序言 这就是中国

初版序言

第一部分 来自这一边	1
第一章 谁在说话?	3
第二章 性别战争	10
第三章 圣言的处女	18
第四章 在时间之外	28
第五章 不愿意存在的我	35
第二部分 中国母亲	41
第一章 身处中心的母亲	43
第二章 儒教——食女人者	64
第三章 社会主义与女权主义	94
第四章 政党与妇女	105
第五章 《婚姻法》(1950年)。民主与爱情。身处 指挥部的女人们	120
第六章 采访	148
第七章 历经新生	185

参考文献	191
关键词条	193
译后记	200

第一部分

第一章 谁在说话?

当坐在打字机前,试图写下我的中国经历时,我的脑海中不断萦绕着一个特别的场面。它使我每每敲击键盘时都犹豫不决,同时又激发着我。我无法对它视而不见,我力图使它在每一页都清晰可见,它就是以下旅程见闻中的关键。

有一天，我们驾车来到离六朝古都西安 40 公里开外的一个县城——户县。那天光照比较强烈，途经一条被烤得炙热的公路时，我们沿途看到一些戴宽边竹帽的农民，有几个无人看管的小孩，在静静地玩耍，还有一辆柩车，旁边簇拥着两队男人，肩上扛着平行的杆子。到达目的地时，按计划我们去看广场边一个建筑物里的农民油画展，我们注意到，全村的人都来到广场上了。他们呆在阳光底下，默默地等着我们，一动不动。他们眼神平静，甚至没有好奇，但有些稍微流露的愉快和渴望，极具穿透力，看得我们几近透明。很明显，这种眼神是属于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群体。他们不去辨认我们是男是女、金发还是褐发、年轻还是年老、脸或身体的这个或那个特征。他们仿佛只是遇见了一些古怪无害但是荒诞的动物，这些动物没有

侵略性，好像来自另一个时空。“这个种族，他们把我们看成另一个人种了”，我们中有人说。翻译说：“你们是第一批来到这个村子的外国人。”他对我们的反应总是很敏感。我并没有像在纽约或者巴格达那样，感觉自己是个外国人。我觉得自己像是个类人猿，一个火星人，一个他者。三小时后当展览厅的大门打开让我们的车子驶入时，他们仍然站在那儿，在太阳底下一动不动——愉快的或渴望的——眼神平静而锐利，表情疏离、一言不发，使我们不知不觉又退回到我们的“陌异性”(étrangeté)里。

田野人类学家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你是一个不同的人种”。但是，对于来到中国的我而言，更重要的是产生了一种震惊，这种震惊来自一个既不异域也不“原始”的社会，和任何“原始思维”也没有什么联系；相反，它来自我们所谓的“现代民族”，它提出了“现代问题”，其中还极易辨识出一些在我们看来落伍的或者令人不安的东西，即某种离我们并不遥远的东西——东欧制度。在这块土地上我不迷惑，因为至少我在那些红卫兵那里，看到了自己在少年先锋队和共青团时期度过的少年时光，也唤醒了我对自己亚裔先人的记忆。这个国度是一个轻松跨进了现代世界的发达文明，却还保留着一种任何异国情调都无法调补的特殊逻辑，因此有一种陌异感长存其中。

我认为，今天中国革命的作用——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就在在我们关于男人或历史的普遍观念之中，使我们得以穿过这一缺口(“这里有他者”)。如果对这个缺口视而不见，那也没必要去中国。显然有人发现了解决方法：其一，他们通过塑造“保卫我们”的中国，来填补这个深渊(在我们西方，如果有人证实中国人在模仿、反对或者忽略我们，我们就有了一项或革命或修正主义或自由主义的事业，这一事业还将得到巩固)；其二，或者塑造“反对他们”的中国(即反对

那些恶意歪曲中国的人们，这些人想迫使中国服务于“他们的”意识形态目标，而不是服务于“我们的”。塑造的是“赞成”还是“反对”；我们的老斗士深谙其道。这一解决之道可对他人提供服务或压制，但它总是促使发现“他者”的这一机会丧失；对他者的发现，带来了机会去追问那些几乎难以察觉却令人不安的、此时此地的新问题，但我们总是丧失这些机会。

试图去勾勒所有的中国文明和中国现代社会的轮廓，确定户县农民们那种复杂凝视的含义，那不是我的目标，也是无用的。事实上，他们什么也没做，除了回应我的目光，对于他们，我也不敢表达出所谓普遍的人道主义、无产阶级的兄弟情谊或虚假的殖民文明。这里，我要突出的是形成我们和户县人之间鸿沟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方面——中国妇女、中国家庭的传统以及当前的革命。我如此选择，出于两个原因：

首先，在我的印象中，诸位专家的研究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近况证实，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时期，妇女和家庭的角色都具有特殊意义，而这为尊崇一神教的西方所不解。因此，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也就是尝试着理解导致它独特的根源，即试图理解我们在户县产生的疏远感。如果我们对女人，对她们的状况和差异性不敏感，我们就会错过中国。那也就没必要对中国感兴趣，我们将走在人前，无法聆听背后户县广场上的沉默；即便最好的情况，有人注意到了这种沉默，充其量也只会觉得麻木、苦恼或者难过，选择永远地与他们隔绝，努力遗忘他们，最终，得以凭同样的方式遗忘整个中国，或者能不费吹灰之力地理解整个中国。

其次，也许更重要的是，做出这一选择是因为，如果在此处说话

的西方的他/她，不置身于我们的一神教和资本主义组织已经分裂、崩溃和毁灭的立场，那么中国的他性(*altérité*)就将是不可见的。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来的，是阶级斗争，是自1968年5月之后出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新结构。当然，他们并没有重复他们所反对的资本主义体系或者传统政治的逻辑。但是，谁没有重复呢，您很了解那些不重复的人吗？他们保留了自己的“新力量”，这些仍然没有被组织起来的人们，惹来阵阵嘲笑，看上去就像是乌托邦主义者和政治“达达”派。如果中国的他性这一新事物是隐形的，那是因为他们处于我们世界的底层，被抑制着，是一神教的资本主义为了从意识形态上建构和巩固自身、为了抵抗所有的危机而去压制的那些事物呈现出来的症候。那些“新力量”，是那些年轻人、那些女人、那些标新立异的艺术家和诗人们……仍然重要的是，他们在当代社会里的痛苦和烦恼，不仅仅是对一个社会关系觉悟了的反讽，不仅仅是一个对新社会秩序的阴郁诉求，而是显露出在此处彼处那些参与了“时代变化”的事物，它们以如此相异的面貌——以“前历史”的终结，以不断求索的梦想与现实的面貌——一出现。

面对女人，我们有机会利用生物学的特性，在资本主义一神教中来命名她们，这个站在表达(*l'expression*)的入口处的女人们，没有声音、身体也暗哑着，总是这个社会统一体的异乡人。事实上，在所有父系或阶级的社会历史里，这个机会是“值得”的，因为实际上，在阶级社会或者父系社会的所有历史之中，正是女性的性别，担当了生产关系及其话语的余渣或者无产阶级后台的角色。但这个机会也是“受限制的”，因为至少从19世纪末，还有一些人（今天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发现，他们也已经变成社会中的“女人”；这（也许）是一个误会，模糊了女性性别的诉求（如果您情愿这么说的话），但它也阻止了某

个女性的“我们”被建构为同质的、“阴性的秘密社团”，它是否继所有逃离了社会限制的事物之后，扩散了我们那无以名状的焦虑？最初关于同一性的探寻无疑是必要的，但若此后人们依然作茧自缚，受限于这种同一性，成为最后“事业”的浪漫战士，成为某种已被颠覆的人道主义神学家，而不让人道主义迸发出来，那就证实，这种机会已经被“盗用”了。

那么面对户县农民的凝视，是谁在说话？站在这里的任何人都不想再成为一个“死去的女人”——圣母、基督处女或者因消逝而美丽的贝德丽采^①。她们的声音脱离了肉身，肉身暗哑；她们的语词节奏和语调被痛苦怪异地堵塞着，色彩富于想象却没有语言、没有声音，也没有形象；她们身处在时间/知识之外，皮肤和内脏上被永远地刻划上多彩的韵律；不论“社会化的”还是“革命性的”斗争，都以她们的身体作为代价；她们的身体癫狂地叫喊着，连时光和岁月也变成了牺牲品；她们的身体被切断和吞并了：一方面，在分娩时享受着失语的快乐(*plaisir aphasiique de l'enfantement*)，它把自己想象为宇宙循环的参与者；另一方面，则身处一种法律（父亲的、家族的、社会的、神的）的象征性压力下，它作为牺牲品，只要一受到否认和拒绝（就算不是对身体的谋杀），便发出喜悦和骄傲的荣光。^②

提起这种重负，用X光透视它，分析它，不亚于一次新的文艺复兴（新生）。伊拉斯谟若在今天，将不会写下《愚人颂》，而应该会对这种社会契约的否定性展开批评，认定对这个共同体“永恒的讽刺”^③是来自女人的。如果情形并非如此，妇女运动恰恰只是产生于一个针

^① “Beatrice”，但丁《神曲》中的人名。——译者注

^② 苏格拉底式的讽刺，指用一连串的问题迫使对方承认自己无知。——译者注

对女性状况的国家秘书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所促进的某种理性化过程，它也不是一无是处，不过……处在转变中的中国，是否将变成我们的希腊？



书中的某些主题、某些名字，是出于偶然的冲动和心情而收集的，但也是由我此次中国之行的目的所决定的。这些主题包括：性别差异；女儿对父系法则的认可；关于拥有多形态愉悦的非政治性、非时间性的诉求；自杀；在一个父亲主导、女人是“另一个人种”的家庭里，“另一种性别”的牺牲；否认这种差异会不可避免地带来的极权主义后果等等。女性的觉醒要求我们西方社会回答的问题，和在这里的问题，构成了一个双重兴趣。

以上情况，首先表明女性——它(*ça*)^①不存在。或者，它分解成了许多“个别案例”。由于后浪漫主义已经了解了这点。（例如，里尔克说道：“那些女人们”、“那些孩子们”和“那些年轻(男)人们”，如此言说是否可能？它可能是我们没料到的、是对整个文明的抛弃和反对？这些词语很久就不再有复数的可能吗？它们只可能被分成无穷小的单数吗？）执迷于对最后的共同体的信任，除了获得避孕药丸和批准堕胎之外毫无用处。或者，对妇女问题的兴趣，仅仅是由于它们被引入到我们这种社会最严重的绝境：不止没有神，还没有男人，该怎样生存？

其次，提前接触这些问题，是为了避免到了中国遇到、有了印象才处理这些问题。我们看到，中国姑娘们在毛泽东的肖像画下，从丈

夫和父亲那里获得了解放，挥舞着画笔与步枪，只有在她们的书法、小孩或者正在进行中的生产、科学或意识形态斗争的成绩上，才让人感受到她们的愉悦。要避免对中国的这一切作琐碎的条分缕析，这不仅是由行文精简的考虑来决定的。它还出于一种警惕，从伦理上来说，就是要避免把中国妇女们所激发的反思投射回她们身上，这些反思实际上是从西方经验中产生的，与她们无关。针对此次中国大陆之行尤其是最后那些“访谈”中的空白和沉默，您会很容易生出关于“两性战争”、“圣言的处女”、“时间之外”或“自杀”之类的无限反思。这样将会产生一个西方视角。维也纳的某位教授或某个人，宣称把握了关于中国的真相，没有什么比这更虚假的了。因此，我们首先得尝试去质疑那建构了我们至少两千年的传统，拒绝认定自己比他们知道得要多，拒绝给我们的问题赋予某种既定的答案。本书就是这样的一幅速写画，一张调查问卷，但答案悬而未决。

^① *ça*，法语中为代词“它”、“这个”等；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里指“本能”或“无意识”，此处一语双关。——译者注